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周　佳　景怀斌*

【摘要】论文以实验方法探析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及其机理。实验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结果显示：①未被激活的观念形态对决策过程有影响，但是不同观念形态之间的被试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②观念形态激活后，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公共问题决策上存在显著差异；③观念形态刺激使被试会倾向于选择与其观念形态一致的备选方案；④观念形态的激活显著减少了被试提出独立观点和方案的数量。这些发现对于公共决策与管理有若干理论启示。

【关键词】观念形态　决策　认知

【中图分类号】B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5）03－0126－25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出现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出现的问题更需要关注。就问题而言，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公共管理者的关注，即当前民众之间因观念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判断、解决方案的冲突性争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群体在对中国现状的分析以及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逐步形成观点迥异的两派，引发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这场争论从最初的自说自话到后期的激烈交锋，一直延续了近10年的时间（李世涛，2000）。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争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凸显，出现了大量带有明显观念形态倾向的网站和论坛，由知识精英间的讨论进入平民话语中，观念形态的对立造成了民众在某些社会问题看法上的

* 周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景怀斌（pusjhb@mail.sysu.edu.cn），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感谢赵玉芳教授、黄敏儿教授、罗俊教授、张书维副教授、孙莎莎博士生以及匿名评审人对论文的评论与建议。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资助。

激烈冲突（乐媛、杨伯溆，2009，2010）。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以新“左”—“右”为标签的观念形态清晰化和两极化问题，它们几乎在所有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问题上有明显差异，甚至情绪化对立，从而对公共认知与政府决策、政策执行产生巨大的影响，是需要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

从认知与决策的角度看，这一现象可以转变为这样的研究议题——观念形态是否会扭曲人对公共问题的“客观”决策，从而对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造成潜在挑战。

本研究以实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二、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理论背景

1. 观念形态的概念

在哲学领域，观念（Idea）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观念指意识和精神，狭义的观念是指思想（钟镇藩，1995）。虽然不同的学者对“观念”的定义有差异，但是从整体上看，“观念”与三种因素有关：一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知觉，也就是印象（Impression）；二是人脑对“印象”的理性处理，即人脑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改造过程。逻辑推理和归纳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是人的情绪与情感。人并非机器，“观念”并非冷冰冰的过程，所以，观念在休谟那里被理解为“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意向”（休谟，1996:1）。“观念形态”（Ideology）是一套观念的系统，为观念的集合体。在张延勃等人（1983）主编的《哲学辞典》中，“观念形态”等同于“社会意识形态”。由于在历史进程中，“意识形态”已经被赋予过多的政治含义，为更好地体现学术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本文选用“观念形态”一词。

从心理层面看，“观念形态”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类本性、社会事件、现存事实以及未来可能的描述和解释，也是对社会应有理想状态的设想”① （Jost et al.，2009:309），它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共有的信念体系，赋予行为以意义，并包含了认知、情感和动机的成分（Jost，2006）。本文是在心理学层面使用“观念形态”概念的。

① 译文为引者自译。

2. 观念形态与决策

观念形态与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侧重于观念形态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原因探讨。在政治科学家看来，观念形态将政治学理论变成了一个信仰—行动系统（Belief - action System），不再进行开放性的问题分析和思考，而是推动人们通过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需求和渴望。作为一种被坚持的信仰体系（Belief System），观念形态本质上是行动导向的，提供了人们行为的基本政治准则（Daniel，1971；Scarbrough，1984；Roseman，1993）。其行动导向主要体现在政治动员和合法性证明等功能上，政治动员促使公民站在冲突中的某一方，经过暗示等方式告诉人们应如何进行政治选择和应具有怎样的政治倾向（Disch，2011；Jost et al.，2009）。

“情感—身份认同”的需要被认为是观念形态能够影响个体决策的原因。观念形态是对人群进行划分的标准之一，这种对人群的划分会给个体贴上带有群体特征的新的标签，同时赋予其某种情感（巴拉达特，2010；Jost et al.，2009）。基德·詹森（Giedo Jansen）等（2013）对15个国家进行的研究结论显示，政党倾向经常与个人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为了显示或者代表自己的阶层，人们会选择相应的党派，并据此决定自己最后的投票选择。杰弗里·科恩（Geoffrey L. Cohen）（2003）的研究证明了作为自变量的观念形态和政党立场的显现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有学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根据自己的观念形态进行决策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属于某一个政党、群体或者阶层，同时表达出类似于“忠诚”的情感，这是出于个体“情感—身份认同”的需要（Jenkins，2006；Leeper & Slothuus，2014；Blais et al.，1993）。

“利益需求”是观念形态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另一原因。有学者对观念形态结构问题的访谈研究发现，个体和观念形态之所以可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观念形态实质上是以需求和利益为基础的信念（Need - or Interest - based Beliefs），观念形态不仅包含了各种需求和利益，还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和利益的可能性（Roseman，1993）。唐斯（2005）认为，投票人在投票过程中是理性的，由于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投票人无法根据具体的政策或问题进行投票，而只能依据自己的观念形态进行选择，以期望能借此获得最大的福利。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人们支持某种观念形态，是因为这种支持可以让自己的政治目标更容易实现（Aldrich & David，1997）。

第二个层面致力于分析观念形态对决策影响的过程及结果。杰维斯（2003）认为，对个体决策产生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外部环境，而是个体的认知过程，在认知过程中，观念形态会对个体的信息处理产生影响。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观念形态会导致个体的信息过程（Information Processes）中产生信息筛选（Informational Shortcuts）的现象（Downs，1957；Campbell et al.，1960；Goren et al.，2009；Kunda，1990；Leeper & Slothuus，2014）。李察·刘（Richard R. Lau）（2006）等人认为，由于人们在决策中面临大量超出自己接受和处理能力的信息，为了节省精力和时间，人们会本能地根据自己的党派倾向来筛选信息，并在有限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拉扎斯菲尔德（2011）认为，人们总是会选择记住那些能支持自己观念形态的信息，而自动忽略那些和自己观念形态不一致的信息。保罗·格伦（Paul Gorenl）等人（2009）则发现，观念形态会导致人们通过党派性的视野（Partisan Lens）来收集和评估信息，即不加思考地接受本党派提出的信息，但是当同样信息由对立党派提出时，人们就会对此进行拒绝并进行过多的思考。观念形态是个体在信息选择上出现差异，带来偏见和盲目决策选择的主要原因（Lenz，2013；Bullock，2011）。

观念形态同样会对个体的逻辑推理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观念形态影响甚至决定了个体进行逻辑推理的原则或路径（Simon & Newell，1971；Newell et al.，1958）。观念形态凸显的个体，在进行决策之前的典型逻辑是“如果……，就会……（if…，would…）”，这主要通过观念形态化的想象来实现（Roseman，1993；西蒙，1988）。在信仰体系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理论看来，观念形态是关于不确定社会现实的理解地图（Geertz，1964）。观念形态主要回答以下这些问题：“我们在哪里？将要去向哪里？最好的通往目的地的路是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正是这些问题将观念形态和行为选择联系起来，决定了人的决策（Scarbrough，1984:27）。

3．观念形态激活现象

与社会层面的观念形态概念不同，个体观念形态是社会观念形态内化于人的精神世界后形成的价值观和信念系统，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人都应该具有某种观念形态倾向，而且可以通过具体标准进行测量（巴拉达特，2010；博比奥，2012；Berry et al.，1998，2012）。个体观念形态的形成是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它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的环境、接受的宣传和教育的影响，还与个体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社会阶层等有关（Jost，2006；Feldman & Johnston，2014；Greenberg & Jonas，2003）。成年人的观念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斯通，1987；Levitin & Miller，1979）。但是，个体的观念形态并非时时清晰可见，也非每分钟都在发挥作用。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形态是模糊不清的，当个体在接触价值中立或缺乏刺激性的材料时，也只是按常规的逻辑进行思维，观念形态作用的发挥可

能需要来自外部的刺激。正如西蒙（1988:87－92）所认为的，那些决定人们决策行为的“内部机制”，往往需要“外部机制”的刺激才能启动。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已有不少关于观念形态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的实验研究。比如香农·麦科伊（Shannon K. McCoy）和布任达·梅杰（Brenda Major）（2007）通过实验刺激启动了被试精英主义观念形态，精英主义的启动会让人更愿意去证明不公平是合理的，影响人们面对不公平（歧视）时做出的解释。特拉维斯·卡特（Travis J. Carter）等学者（2011）的实验证明人的政治行为和决策可能被一些环境中的暗示性因素所影响，当研究被试暴露在有国旗的环境中时，被试的保守主义观念形态就会被启动，进而影响被试对候选人的判断和最终的投票选择。启动效应研究证明了外界观念形态刺激会对个体的认知与决策产生影响。但是与其他心理学中的“启动”研究一样，观念形态的“启动”研究只强调外界实验刺激的作用，而个体本身的特征并不受重视，也就是说，个体原有的观念形态是不作考虑的。

拉扎斯菲尔德对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治选战和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政治选战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强加给人们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启动），而在于“激活”人们原有的政治倾向。他认为，个体原有的政治倾向就像是胶卷的底片，而政治倾向的激活，就像是相片显影剂的作用，“可以让潜在的政治倾向变得可视并表达出来”（拉扎斯菲尔德，2011）。布莱恩·琼斯（2010）也指出，通过政治宣传等外部刺激，个体的观念形态可以被刻意地激活，从而影响议程设置和公共政策决策。其基本机制是，价值观（观念形态）是人行为决策的标准，虽然价值观的作用经常是下意识的，但是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被唤醒和表达（Latham & Pinder，2005）。

（二）研究问题

已有的研究证明，个体的观念形态可以通过外在刺激激活，且会对决策产生影响。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大量模糊，甚至是“黑箱”的领域，需要回答：

第一，未被激活的观念形态是否会对决策产生影响。个体已有的观念形态是否会对决策发生作用？观念形态在被激活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观念形态激活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已有的静态的、断点式的研究无法回答该问题，需要以新的研究设计来回答之。

第二，激活后的观念形态如何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已有研究发现，观念形态会影响决策过程中的信息筛选和逻辑思维，但是这种影响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在面对客观事实材料的判断和主观推理想象的过程中，观念形态对决策的影

响是否会有差别？更重要的是，现有的研究无法解释外在的观念形态刺激和个体内在的观念形态之间的交互作用。比如："左"、"右"以及"中"的个体，在接受"左"的材料刺激后，会呈现出怎样的决策特点？他们是一起更偏好"左"的选择？还是"左"的更偏好"左"，"右"的更偏好"右"了呢？原本"中立"的被试是否会动摇？是否会带来一些特殊的决策效果？不同的研究结论在这个方面经常是矛盾的。对此，应基于实验数据，进行深度剖析。

第三，观念形态作用机制的跨文化比较。观念形态本身具有典型的地域性特征，它不但受到各国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深刻影响（Klingemann，1979；Gordon & Segura，1997），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划分和表现也是不同的（巴拉达特，2010）。以往关于观念形态与决策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社会为背景进行的，对当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观念形态对决策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中国社会中的观念形态如何影响公民决策？这是值得讨论的本土公共管理现象。

本研究将通过实验室研究回答上述三方面的问题。

三、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

通过实验室实验的方法研究观念形态及其激活对个体决策结果产生的影响。实验采用3（观念形态：左、中或右）×2（观念形态激活状态：激活或未激活）的被试间设计。实验包括两个自变量：自变量1为被试原有（潜在）的观念形态，主要通过自编的《新"左"—"右"观念形态量表》进行测量，① 被试的观念形态被分为"左""中""右"三个水平。自变量2为观念形态的激活状况，包括激活和非激活两个水平，主要通过呈现不同的实验材料实现操控。

所有被试按其观念形态被随机分配到激活组（接受观念形态激活）和未激活组（不接受观念形态激活），共形成六个组，分别是：A1组（"右"激活

① 本研究最初拟采用已有的西方观念形态量表筛选被试，结果发现并不适用，因此研制了《新"左"—"右"观念形态量表》。其编制依据为：中国学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的核心问题的概括，以及"左"、"右"论坛的争论焦点分析，经过417份问卷标准化而形成。该量表由20个题目、四个维度构成：①对中美发展模式的看法（共5题，$\alpha=0.72$）；②对毛泽东及其历史时期的看法（共5题，$\alpha=0.71$）；③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共5题，$\alpha=0.67$）；④自由、人权价值观取向（共5题，$\alpha=0.65$）。总体α系数为0.78。量表的详细情况，另有专文报告。

组）、A2 组（“左”激活组）、A3 组（“中”激活组）、B1 组（“右”未激活组）、B2 组（“左”未激活组）和 B3 组（“中”未激活组）。

（二）被试

按照实验研究的常规做法，通过张贴广告和直接在课堂上发放问卷的方式来招募实验被试。有可能参与实验的同学都须先接受观念形态调查，填写专业、年龄、性别、参与实验意向和联系方式等。观念形态量表在实验主试和实验助理的管理下发放和填写，现场回收。每位填写完问卷的同学可获得参照学校勤工俭学标准的适当报酬。共在中山大学本科生中发放问卷 431 份，回收有效问卷 417 份。

问卷回收后，按照观念形态标准对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分类整理，排除掉在问卷中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实验的同学（约占 4.56%），在剩余同学中按 10% 的比例挑选左、中、右被试各 40 名，最后共获得 115 名有效被试①。其中，“左”39 名，“中”38 名，“右”38 名。性别比例为：男生 40 名，女生 75 名，年龄在 18—24 岁（$M = 20.25$，$SD = 1.30$），本科一至四年级生人数分别为：33 人、50 人、23 人和 9 人，来自中山大学的 13 个学院。

（三）实验材料

1. 背景材料

背景材料根据现实中的真实材料进行改编，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对 A 市张市长的基本描写，如受教育背景、之前的工作情况等。对张市长的描写简单直白，以保证无法从中获得其他更多信息（如性格、执政理念等）；第二，一份常规的政府工作报告（节选），报告人为张市长。在实验中，观念形态激活组和未激活组的被试均需阅读背景材料，在此基础上对决策的人物和环境有大致的了解。背景材料为最常见的媒体对政府和官员的报道，语言描述中性。

2. 实验刺激材料（观念形态效应激活）

激活组的材料带有强烈的观念形态导向，主要包含两部分，分别对被试原有的观念形态进行标签激活和要素激活：第一，标签激活。通过 1990 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介绍，向被试介绍了争论双方的核心观点，并让被试思考自己的立场。第二，（左倾）要素激活。对虚拟的市长进行详细介绍，包括

① 其中有 4 人未能准时参加实验，有 1 人被发现冒名顶替他人，故将其数据删除，剩余有效数据 115 份。

两段对张市长的访谈材料。第一段材料凸显了当时还是“大学老师”的张市长被称为“毛泽东的坚定拥护者”。在访谈中，他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热爱，并反驳了对毛泽东的种种批评。第二段材料是张担任市长后接受采访的材料，他强调公平和政府的作用，无论是执政理念还是具体的施政方针都体现出了“左”的倾向。为了防止实验刺激对决策问题产生直接干扰，实验刺激除了带有强烈的“左”观念形态外，和决策材料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决策中的土地纠纷问题也被假设成是前任政府遗留的问题。

非激活组的材料则不带有任何观念形态导向，内容是两段户外运动的介绍。材料构成在字数和格式上与激活组基本一致。

3．决策材料

决策材料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前测中呈现，为决策问题的产生，决策问题是一则虚拟的美国企业、A 市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在土地赔偿问题上的纠纷问题。材料显示，某美国企业为了在 A 市进行投资，征用了 A 市城乡结合部 200 余亩土地。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美国企业、市政府与当地农民进行了谈判和赔偿工作，最后双方签订了合同。但是在一年后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到市政府上访，他们觉得当初的补偿过程中存在欺骗，而且赔偿款过少，使他们在失去土地后生活陷入困境，因此希望政府可以帮助解决工作，并要求美国企业进行补偿。但是美国企业则认为，当初他们已经按照合同完成了农民土地的赔偿工作，所以拒绝了农民的要求。

第二部分在后测中呈现，为决策备选方案的提出。材料显示，针对该纠纷，市政府给出了三种备选方案，三种方案分别是“右”立场的市场主导方案、“左”立场的政府主导方案和“中”立场的市场政府共同作用方案。在后测中，被试需要重新对事件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同时还需在三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一种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前、后测问卷中还包含了用于测量被试决策逻辑（推理和想象过程）的主观题两题。

（四）实验流程

采用 java 程序编写所有实验材料，这些实验材料会按实验流程在电脑上呈现，电脑自动记录被试在电脑上的所有操作。实验共 6 个步骤，依次进行①：

① 在实验正式进行前，已进行两轮预实验，以保证实验材料符合精确、易读的标准，实验流程切实可行。为了防止潜在的实验被试被污染，预实验被试与潜在实验被试严格分离，采取在其他学校进行预实验，同时要求所有预实验被试签订保密协议。在预实验结束后，根据被试反馈，对实验材料进行相应的修改。

第一，准备。被试按组进入实验室，按编号坐到相应的电脑前。每台电脑之间都有隔板，保证被试独立完成。实验主试向被试朗读指导语，介绍实验流程、注意事项等内容。

第二，背景材料阅读。实验开始后，被试点击电脑桌面上的实验图标，输入自己的被试编号，进入实验。电脑程序会自动显示背景材料，被试根据引导语阅读 A 市市长的简短介绍和政府工作报告（节选），在材料阅读的时间结束后（3 分钟），材料会消失。

第三，前测。电脑程序按顺序显示决策材料的第一部分，被试进行阅读并对土地纠纷事件做出基本判断和推理。

第四，激活材料输入。每位被试拿到一份纸质材料和一支笔，允许被试在纸上做记号。其中激活组的被试拿到一份具有强烈“左”观念形态特点的访谈材料，非激活组拿到一份不具有任何观念形态倾向的材料。被试还被告知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理解能力进行测量，他们要尽可能地理解看到的内容。两份材料在字数和所需的阅读时间上大致相当。阅读材料时间为 8 分钟，阅读完以后材料会被收走。

第五，后测。被试继续在电脑上完成后测。首先，被试需在重新对土地纠纷事件做出判断，题目类似于前测。之后，被试将阅读到第二段决策材料，并在三个决策方案中进行选择或者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

第六，猜测实验目的和公布实验真实意图。实验结束后，实验主试告知被试实验的真正目的，对实验中存在的欺骗行为寻求被试的谅解。最后，按当地一般报酬水平，被试领取 50 元实验报酬后离开。

四、结果与分析

（一）观念形态划分及操作检验

观念形态划分的有效性需要通过比较“左”“中”“右”被试的量表得分进行检验。本研究中，所有被试的观念形态得分的均值为 53.94（$SD = 10.96$）。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左”（$M = 64.79$，$SD = 3.61$）、“中”（$M = 55.66$，$SD = 2.94$）、“右”（$M = 41.08$，$SD = 7.15$）被试的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F(2, 112) = 227.69$，$p < 0.001$）。事后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左”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中”被试，也显著高于“右”被试，“中”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右”被试（p 值皆小于 0.001）。这表明，本研究对于被试观念形态划分的操

作是有效的。

115 名被试按观念形态（“左”“中”“右”）随机分入激活组与非激活组，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按不同观念形态进行分组的被试，在激活组和非激活组的前测结果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p 值皆大于 0.1），说明实现了随机分组的目的。

（二）前测组间比较

为了检验未激活状态的观念形态对决策信息认知的影响，在前测中，具有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首先需要阅读决策材料的第一部分，材料显示了土地纠纷事件产生的原因，以及事件中存在的多方矛盾。在规定时间内阅读完材料后，所有被试需要接受两个部分的测量：

第一部分测量被试对土地纠纷事件的基本态度和判断。在该部分，被试需要填写自己对土地纠纷事件中各方行为的态度。包括，“是否赞成 A 市政府引进外资建立外贸市场的行为”，“每亩地 6 万元的补偿款是否合适”，农民代表所提的三个要求是否合理（针对三个要求分别提问），“美国企业拒绝赔偿的态度是否合理”，共 6 题客观题，皆采用 Likert 量表 5 点计分的方式。以被试的观念形态为自变量，分别对 6 题的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左”“中”“右”被试在对决策事件的基本判断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别（p 值皆大于 0.05）。在对事件责任的认定上（“对农民上访这件事，您觉得责任主要在谁?”），Fisher 精确检验的结果显示：[①]“左”“中”“右”被试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p=0.808$），“左”“中”“右”被试中均有接近或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三方（政府、农民、美国企业）都有责任”，选择是“农民的责任”或“政府的责任”的人数居中，选择“其他”的人数最少。[②] 这说明，在未接受观念形态激活前，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对纠纷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上并无显著差别，他们对事件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

前测的第二部分为主观题，需要被试脱离客观材料，通过主观想象来猜测“当时的 A 市政府会偏向于哪一方？是农民还是投资商，为什么?”结果显示

---

① 在单元格期望频数小于 1，或者有 20% 以上的单元格期望频数小于 5 的情况下，采用 Fisher 精确检验，无卡方值和自由度，只有 p 值。参见（张厚粲、徐建平，2003:256－257）。

② 按照卡方检验的数据处理原则，实验中无人选择“是美国企业的问题”的选项，因此在进行检验时将该选项去除，选择“三方都没有责任”的人数较少，出现了单元格期望频数为 0 的情况，因此将其与“其他”选项进行合并，最后进行卡方分析因变量的四个选项分别是：“是政府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三方都有责任”和“其他”。

（表1），在前测中，“左”“中”“右”被试对政府偏向的想象不存在显著差异（Fisher 精确检验，$p=0.148$），如果仅比较“左”“右”被试的观点，则可以发现“左”被试和“右”被试对政府行为想象的差异存在边缘显著（Fisher 精确检验，$p=0.064$），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虽然“左”“中”“右”被试都更倾向于认为政府会支持美国企业，但是在“左”被试中，仍有20.51%的人认为政府会倾向于支持农民，而“右”被试中只有5.26%人认为政府会倾向于农民。

表1　猜测A市政府的偏向

		请您猜测当时的A市政府会偏向于哪一方，是农民还是美国投资商？			
		支持农民	支持美国投资商	其他	合计
观念形态	“右”	2（5.26%）	35（92.11%）	1（2.63%）	38（100%）
	“左”	8（20.51%）	28（71.79%）	3（7.69%）	39（100%）
	“中”	7（18.42%）	30（78.95%）	1（2.63%）	38（100%）
合计		17（14.78%）	93（80.87%）	5（4.35%）	115（100%）

对主观题答案进行梳理和编码（表2），可以发现不同观念形态被试的思维逻辑：“右”被试强调契约和协议的重要性，所以“协议必须遵守”是他们认为政府会支持投资商的最主要原因。同时，“右”被试的逻辑推理中还包含了大量对政府行为负面动机的归因，比如认为政府是因为可以从投资商手中获利（官商勾结）或是农民容易被压制才支持投资商。相反，“左”被试和“中”被试则认为“投资商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是政府会支持投资商的主要原因，他们对政府会支持投资商的归因大多数是正面的，相对“右”被试而言，“左”和“中”被试中有更多人认为政府会倾向于农民，原因是政府本来就应该代表本国人民利益。

表2　不同观念形态被试政府偏向推测归因

政府支持投资商的原因	“左”被试	“中”被试	“右”被试
①投资商没有错，协议必须遵守	9	9	15
②投资商可以发展当地经济	18	20	11
③投资商可以让政府/官员获利	4	5	10
④如果政府支持农民，将会使以后的征地工作变得更困难	1	0	2

（续上表）

政府支持投资商的原因	“左”被试	“中”被试	“右”被试
⑤农民势单力薄，容易打压	5	5	9
⑥中国政府不敢得罪投资商	3	0	0
⑦其他	0	2	2
政府支持农民的原因			
①为了“维稳”	4	4	1
②农民的要求是合理的	1	1	1
③农民更值得同情	2	0	0
④因为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帮助农民是义务	4	4	0
⑤其他	1	0	0

*注：表中的数据表示提及该原因的人次，一个被试可能同时提及其中的几点原因。

由前测结果可知，在观念形态未被激活时，面对客观事件材料，“左”“中”“右”被试的判断并未出现差异，被试观念形态的作用没有凸显。但是在需要被试展开推理和想象的时候，“左”“右”被试之间的差异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三）后测组间比较

在实验刺激环节，激活组的被试接受了带有明显“左”观念形态的实验材料刺激，未激活组被试则未接受观念形态激活。后测中，被试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测量：

1．立场和责任判断

被试需要回忆在前测中见过的土地纠纷事件，确定自己在该事件中的立场（“在这次事件中，您更愿意支持哪一方？”），并且再次判断事件的主要责任方是谁？首先，在立场上，Fisher 精确检验的结果显示，“左”“中”“右”被试在这一题的结果上差异显著（$p = 0.012$）。为了进一步检验实验刺激带来的影响，将观念形态激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对激活组和未激活组的结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未激活组中，具有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答案选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Fisher 精确检验，$p = 0.192$）。而在激活组中，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支持方的选择上则存在显著差异（Fisher 精确检验，$p = 0.010$）。激活组和未激活

组的具体选择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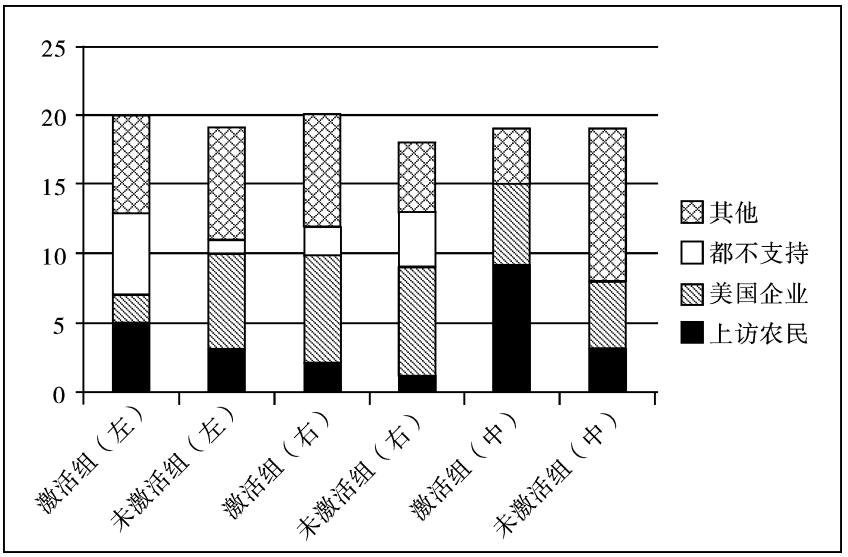

图 1　激活组和未激活组在立场选择上的比较

图 1 显示，相对未激活组而言，观念形态激活组的“左”被试选择“支持上访农民”和“都不支持”的人数更多，而选择“支持美国企业”和“其他”的人数更少。激活组的“右”被试相对未激活组而言差距不大。差距最大的为“中”被试，激活组中支持上访农民的人数明显多于非激活组。

之后，被试再次对事件责任进行判断，面对的问题与前测一模一样。结果显示，激活组和未激活组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chi^2 = 10.59$，$df = 3$，$p = 0.023$），如表 3 所示：

表 3　事件责任判断

		对于农民上访这件事，您觉得责任主要在谁？				
		政府的问题	农民自己的问题	三方都有责任	其他	合计
是否激活	激活组	18	4	29	8	59
		(30.50%)	(6.78%)	(49.15%)	(13.56%)	(100%)
	未激活组	6	10	36	4	56
		(10.71%)	(17.86%)	(64.29%)	(7.14%)	(100%)
合计		24	14	65	12	115
		(20.87%)	(12.17%)	(56.52%)	(10.43%)	(100%)

激活组选择“是政府的问题”的人数明显多于非激活组，而非激活组选择是“农民自己的问题”的人数则多于激活组，也就是说，经过“左”观念形态激活后的被试更倾向于让政府为这件事情负责，而未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被试则认为农民自己应该对事件负主要责任。不论是站在农民这边，还是认为“政府应该为此事承担主要责任”都显示出“左”的特点，说明激活组的选择受到了实验刺激的影响。同时，后测结果也显示，“左”“中”“右”被试的结果并无显著差异（Fisher 精确检验，$p=0.900$）。

2. 方案选择

在该部分，被试需要先阅读一份简短的关于该决策问题的三种备选方案，并让被试在三个决策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最赞成的方案或提出自己的意见。第一种方案为“市场和契约导向”，该方案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一切都应当以法律、合同、协议和市场的规则来办事，不可以在协议生效几年后再次增加每亩地的补偿，而且也不赞成帮农民解决工作和给农民发放生活补贴”。第二种方案为“政府和大众导向”，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弱势群体，农民因为征地的事情失去土地，生活陷入困境，政府应该帮其解决问题，尽可能满足农民提出的三点要求，同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促使美国企业承担一部分责任”。第三种方案为“折中协商导向”，认为“政府应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让美国企业和农民再次坐下来谈判，然后根据谈判的结果来处理”。此外，如果上述三种方案被试都不赞成，则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首先从总体上来看，在决策方案的选择上，如表 4 所示：

表 4　激活组和未激活组决策方案的选择人数

		您赞成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自己的意见	合计
是否激活	激活组	6 （10.17%）	20 （33.90%）	22 （37.29%）	11 （18.64%）	59 （100%）
	未激活组	5 （8.93%）	14 （25.00%）	14 （25.00%）	23 （41.07%）	56 （100%）
合计		11 （9.57%）	34 （29.57%）	36 （31.30%）	34 （29.57%）	115 （100%）
观念形态	“右”	8 （21.05%）	10 （26.32%）	9 （23.68%）	11 （28.95%）	38 （100%）
	“左”	1 （2.56%）	14 （35.90%）	13 （33.33%）	11 （28.21%）	39 （100%）

（续上表）

		您赞成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方案？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自己的意见	合计
观念形态	“中”	2	10	14	12	38
		（5.26%）	（26.32%）	（36.84%）	（31.58%）	（100%）
合计		11	34	36	34	115
		（9.57%）	（29.57%）	（31.30%）	（29.57%）	（100%）

激活组和未激活组在决策方案的选择上存在边缘显著差异（$\chi^2=7.09$，$df=3$，$p=0.069$）。经过“左”的观念形态刺激的被试，在方案2和方案3的选择人数上都多于未激活组。也就是说，相对于未激活组而言，激活组更倾向于选择具有政府导向的第二个方案，以及将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相结合的第三个方案。与此同时，激活组中发表独立意见的人数（11人）却远远少于未激活组（23人），不到未激活组人数的一半。

同时，如表4所示，在方案1（市场/契约导向）上，选择人数最多的为“右”被试，在方案2（政府/大众导向）上，选择人数最多的为“左”被试。而“中”被试则更多地选择方案3（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在提出自己意见的人数上，“左”“中”“右”被试非常接近。

为了进一步分析实验刺激对“左”“中”“右”被试的影响，以观念形态的激活状态为控制变量，采用多重列联表的方式，分别对激活组和未激活组的决策情况进行分析，具体频数分布如下：

表5　未激活组和激活组中的决策方案选择人数

		您赞成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方案？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自己的意见	合计
未激活组	“右”	2	5	4	7	18
观念形态		（11.11%）	（27.78%）	（22.22%）	（38.88%）	（100%）
	“左”	1	6	5	7	19
		（5.26%）	（31.58%）	（26.32%）	（36.84%）	（100%）
	“中”	2	3	5	9	19
		（10.53%）	（15.79%）	（26.32%）	（47.37%）	（100%）
合计		5	14	14	23	56
		（8.9%）	（25.00%）	（25.00%）	（41.10%）	（100%）

（续上表）

		您赞成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方案？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自己的意见	合计
激活组	“右”	6	5	5	4	20
观念形态		（30.00%）↑	（25.00%）—	（25.00%）↑	（20.00%）↓	（100%）
	“左”	0	8	8	4	20
		（0%）↓	（40.00%）↑	（40.00%）↑	（20.00%）↓	（100%）
	“中”	0	7	9	3	21
		（0%）↓	（33.33%）↑	（42.86%）↑	（14.29%）↓	（100%）
合计		6	20	22	11	59
		（10.2%）↑	（33.9%）↑	（37.3%）↑	（18.6%）↓	（100%）

注：图中箭头表示激活组相对未激活组人数的变化，“↑”表示上升，“↓”表示下降，“—”表示基本持平。

首先，未激活组的结果显示（表5），未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被试在决策选择上非常接近，不存在显著差异（Fisher 精确测量，$p = 0.941$），从总体上来看，选择方案2和3的人数较多，同时，提出自己意见的被试占据了绝大多数（41.1%）。

其次，激活组的结果则显示（表5），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被试在方案选择上呈现出了边缘显著差异（Fisher 精确检验，$p = 0.061$）。激活组的“右”被试中，选择最多的为方案1，“左”被试选择最多的为方案2，“中”被试和“左”被试一样，没有人选择方案1，而是更倾向于选择方案2和方案3。同时，不论是“左”被试、“右”被试还是“中”被试，在激活组中提出自己独立意见的人数大大少于未激活组。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得知：第一，在未经观念形态激活的未激活组，被试原有的观念形态并不对其决策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激活组中，观念形态对决策的影响显著。“右”被试会偏好于带有“市场和契约”导向的方案1，“左”被试会选择“政府和大众”导向的方案2，“中”被试则偏好于协作导向的方案3。第二，激活组的“中”被试，在接受“左”观念形态激活以后，受“左”的观念形态影响的效果明显，相对未激活组，选择方案2（政府导向）和方案3（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人数明显更多。第三，激活组提出自己意见的人数不到非激活组人数的一半，说明观念形态的激活不但不能让人的决策思维变得更活跃，反倒会让人的思维模式产生固化，减少人进行自由思考、提出独立意见的可能性，而更倾向于在已有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3. 决策推理

最后，后测问卷要求被试再次推测 A 市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只是决策者不再是笼统的“A 市政府”，而是在激活材料中出现的，带有明显“左”的观念形态的“A 市张市长”（HQ14_ 05：“2008 年，张景刚当选为 A 市市长，即遇到了农民上访的问题，您觉得他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是否会答应农民的要求？为什么？”）

实验结果显示，不论是激活组还是未激活组，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之间皆不存在显著差异（p 值都大于 0.1），激活组和未激活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chi^2 = 19.63$，$df = 2$，$p < 0.001$），如表 6 所示：

表 6　推理与想象

		您觉得张市长是否会答应农民的要求？			
		会答应	不会答应	其他	合计
是否激活	激活组	42	4	13	59
		(71.19%)	(6.78%)	(22.03%)	(100%)
	未激活组	17	13	26	56
		(30.36%)	(23.21%)	(46.43%)	(100%)
合计		59	17	39	115
		(51.30%)	(14.78%)	(33.91%)	(100%)

经过“左”观念形态激活的激活组中有将近 71.2% 的被试觉得刚刚上任的张市长会答应农民的要求，剩余的 22% 选择了“其他”，只有 6.8% 的人认为张市长不会答应农民的要求。但是在未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未激活组中，有将近 25% 的人认为在背景材料中看起来还算亲民的张市长不会答应农民的要求，另外有 46.4% 的人选择了“其他”。激活组反应出观念形态激活以后所带来的刻板印象，即“‘左派’的市长一定会支持农民提出的要求”。刻板印象减少了人们进行理性思考的努力，实验中的部分被试不再像前测那样根据对事实材料的分析来进行推测，而是根据张市长的观念形态倾向直接推测出他会答应农民提出的要求的结论。在激活组的 59 名被试中，有 16 名被试的猜测是直接根据张市长的“左”立场做出的，其中更有 4 名被试，直接并且只提到了“因为张市长是‘左派’，所以一定会支持农民”的逻辑。此外，和之前的检验结果一样，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激活组，提出独立意见的人数仍然只有未激活组的一半。激活组的绝大多数人（77.97%）只在“是”和“否”之间进行了选择，而未

激活组中提出独立观点的人则占了将近一半（46.43%）。这同样说明，观念形态思维方式，不仅决定了人们思维的方向，而且还削弱了人们思维的广度和范围。

五、讨论

（一）未被激活的观念形态

前测的实验结果显示，在面对客观事实材料时，处于未激活状态的观念形态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对土地纠纷事件的基本态度和责任判断上，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并未出现显著差异，立场基本一致。但是在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想象推理的过程中，观念形态较为极端的被试则出现了差异。西蒙（1982）曾指出，价值观之所以会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决策的结果产生于未来，决策中存在大量不确定的因素，这些未知的部分只能通过人的想象来填补，而正是在这个想象的过程中，价值观和观念形态开始发挥作用。唐斯（2005）在研究投票人决策的时候同样强调了不确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在个体决策的过程中，因为信息的有限性，人面临大量未知的事件，比如：不知道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不知道任何政策可能产生的结果等，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个体依靠自身观念形态提供的逻辑来进行判断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有大量学者的研究都证明，在面对各种媒体宣传，决策信息过量时，人们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念形态来进行信息选择和决策，这个过程是充满偏见和缺乏思考的（Kahan，2013；Leeper et al.，2014；Lau & Redlawsk，2006；Goren et al.，2009）。本实验的前测结果检验了在决策“信息量适度”和“信息量匮乏”的情况下，观念形态不同的个体在决策认知上的差异。前测结果发现，在对客观事实材料进行简单判断时，因为信息充分而单纯，所以人们可以根据事实本身或者更为基本的社会规则、道德标准来进行判断，观念形态不同的个体在对决策事实的认知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偏见和缺乏思考的现象没有出现，此时，观念形态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在面对信息匮乏，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个体更有可能会受到内在观念形态的影响。为了在信息缺乏的决策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个体不得不进行推理和想象，这个过程使沉睡中的观念形态开始苏醒并发挥出作用。在实验中，“右”被试开始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无疑会站在国外企业家这边，背后的逻辑是“市场契约是重要的”，相对而言，“左”被试中有更多人认为政府会站在农民这边，因为“政府本来就应该代表本国人民的

利益”。在“左”被试的想象中，政府经常是正义的化身，而在“右”被试的想象中，政府更有可能是邪恶的。

（二）激活的观念形态

通过对实验后测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激活组的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呈现出了与未激活组截然不同的反应，观念形态激活对决策产生了以下影响：

1. 外在观念形态刺激的“牵引”作用

后测结果显示，未激活组的被试在矛盾方的立场选择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激活组的被试在立场上则存在差异（$p = 0.010$）。仔细观察激活组内“左”“中”“右”被试的立场选择情况，可以发现，相对于未激活组而言，不论是“左”“中”还是“右”被试，都呈现出了更明显的“左”特征，有更多的人选择了“支持上访农民”。相对而言，激活组中的“右”被试受“左”观念形态的“牵引”较小，原因可能在于，被试原有的观念形态阻止了其受到外界对立观念形态的“牵引”。正如拉扎斯菲尔（2011:79）所说，具有强烈的既有政治倾向的人，实际上是最不可能“倒戈”的人。激活组中的“中”被试受外界观念形态“牵引”的影响最大。在激活组中，“中”被试选择“支持上访农民”的人数是未激活组人数的3倍（分别是9人和3人）。同样，在对“谁应该对此事负责”的问题上，激活组中有超过30%的人选择了带有明显“左”观念形态特征的“政府应该对此负责”，而在未激活组中，该比例只有10.71%。总体上来看，相对于未激活组，激活组的被试更多地表现出了“同情底层人民”和“强调政府作用”的“左”的特征。同样，观念形态的“牵引”作用也体现在对认知过程的影响上，相对于未激活组而言，激活组更容易得出“张市长会答应农民的要求”的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观念形态与个体的立场和情感密切相关。观念形态宣传的作用在于激发人们的某种立场，比如对某些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看法（Leeper et al.，2014；Roseman，1993）。有研究发现，观念形态宣传可以带来“强化”和“倒戈”的效果。一方面使具有同样观念形态的个体更加坚持原有的选择，另一方面则鼓动持有相反观念形态的人进行“倒戈”，而选战最主要的任务在于拉拢原先位于中间的摇摆不定的选民（拉扎斯菲尔德，2011）。本研究发现：在实验中接受“左”观念形态刺激的被试，不论其原有观念形态如何，都可能受到“左”的观念形态的“牵引”，更易表现出“左”的特征，而最易受到观念形态“牵引”的正是那些处于“中立”、摇摆不定的人群。在受到外界“左”观念形态的刺激后，激活组的“中”被试在立场和责任判断上出现更加明显的“左”

的倾向。

2. 决策偏好的观念形态化

在决策选择上，激活组也比未激活组更多地选择了具有明显“左”偏好的方案2（$p=0.069$）。但是对激活组的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激活组中，被试仍然更倾向于选择和自己原有观念形态相一致的方案，原有观念形态仍然在发挥作用。实验结果显示：激活组中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决策方案的选择上存在边缘显著（$p=0.061$），其中，有30%的“右”被试选择了带有“右”倾向的方案1：重视市场契约，反对补贴农民。而这一方案在激活组的“左”被试和“中”被试看来，是完全无法接受的（选择这一方面的“左”被试和“中”被试人数为0）。激活组的“左”被试中有40%的被试选择了更具“左”特点的方案2，认为应该尽可能满足农民提出的三点要求，同时促使美国企业承担一定责任，“左”被试中选择方案3的人数也较多。“中”被试中则有42.86%的人选择了更为“中立”的方案3，希望三方能够再次通过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而在未激活组中，“左”“中”“右”被试的决策选择没有显著差别（$p=0.941$）。

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西蒙（1988:87－92）认为：决定人行为模式的有两种机制，分别是“行为一旦有了方向，就坚持该特定方向那些机制”和“引导行为朝向某一方向的那些机制”，分别称其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经常表现为某种习惯，而外部机制则是来自于外部的刺激。在本研究中，“左”的观念形态刺激类似于“外部机制”，会引导人们朝向某一方向，而作为“内部机制”的个体原有的观念形态则更为牢固，包含大量价值判断的观念形态决定了人们决策的目标和实现的路径，促使人们坚持按那个方向前行。

同时，研究也显示了观念形态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特征。斯通（1987）认为，“因为观念形态深植于个人的信念和态度的网络中，而且通常是潜意识地持有某种观念形态，所以它相当稳定”，并认为在一个人成熟以后，观念形态就难以有实质性的变化。同样，观念形态的作用也具有持续性。特蕾莎·列维京（Teresa E. Levitin）和沃伦·米勒（Warren E. Miller）（Levitin & Miller，1979）通过对1972—1976年总统选举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证明了人们的观念形态具有持续性，在这几年中，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念形态对候选人进行选择和评估，连续性相关系数（Continuity Correlation）达到0.65。本研究的结果发现，就算在受到某种观念形态的刺激以后，人会暂时出现被该种观念形态“牵引”的现象。但是在面临最终决策的时候，人自身原有的观念形态仍然是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形态及其作用是非常困难的。

3．思维的观念形态局限

本研究的另一个有趣发现在于观念形态激活对独立意见数量的影响。不论是客观题（表5）还是主观题（表6），激活组的被试都更少提出自己独立的观点，而是更多地从已有的选项中进行挑选，从中可见观念形态激活对独立和创新思维的局限。

乔斯特等学者（Jost et al.，2009）认为，社会观念形态是由上层社会精英建构的，观念形态的作用在于让人们更容易地接受已经存在的事实。关于观念形态的“制度合理性”（System－justifying）功能的研究结论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因为受到原有观念形态的影响而有意或者无意地去对社会现状进行合理化，变得更为顺从（Tyler，2006；Jost et al.，2004）。信仰系统的“认知地图”理论则更详细地说明了观念形态如何决定了人思维的目的、方向和具体的路径选择。该理论认为，观念形态系统不仅赋予各种事物和陈述（States）以意义，还决定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各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Geertz，1964；Scarbrough，1984）。

观念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的体系，在任何社会中都历史性地发挥着作用（阿尔都塞，1984）。当社会层面的观念形态内化为个体的观念形态以后，人的认知和决策过程就会受其限制。人的思维可能呈现出某种单一性的特征，多元、辩证、否定性的思维模式逐渐消失（马尔库塞，1989）。实验结果证明，观念形态的激活会将个体的思维模式局限在观念形态所规定的路径上，产生了思维的观念形态局限。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证明，观念形态激活会影响个体对公共问题的判断和选择，它们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外界刺激的解释上，也表现在偏好和思维内容上。具有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其观念形态被激活后，都会对其决策选择产生明显影响，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原有观念形态相一致的决策方案，而忽视对决策问题和方案本身的思考。同时，观念形态被激活后，个体进行独立思考和创新性思维的能力减弱，被局限在各种观念形态的框架中无法自拔。

就研究拓展看，在将来的研究中，可以继续尝试多种观念形态激活方式（比如采用“右”的激活材料），也可以研究观念形态激活对不同决策制度的影响，有可能会获得更多有意义的发现。

观念形态激活对决策的影响对公共管理有一定的启示：

第一，新“左”—“右”观念形态已是中国社会主流观念形态之外的“亚观念形态”现象，是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应进行价值中立的研究。

第二，公共决策问题应关注其观念形态化特征。可以参考的方式是：其一，公共问题传播时应该尽量避免激活受众的观念形态。观念形态的激活，会带来大量充满情绪化和偏见的意见，不但无益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反而可能会引发不同观念形态的公民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公共问题的传播应尽量少使用观念形态化的符号和话语，避免观念形态激活；其二，人在决策问题明确，决策信息简洁且充分时，激活或未激活的观念形态对决策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在向决策者呈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应该尽量保证决策信息的清晰和充分。如此，可以减少观念形态激活对决策的干扰。

第三，观念形态激活后出现的决策观念形态化，说明人的决策并不完全是基于事实的客观判断。因此，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应有自省的习惯，反思自己的观念形态有可能对决策产生的影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阿尔都塞(1984). 保卫马克思. 上海：商务印书馆.

安东尼·唐斯(2005). 民主的经济理论.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伯纳德·贝雷尔森、赫泽尔·高德特(2011). 人民的选择.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布莱恩·琼斯(2010). 再思民主政治中的决策制定.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赫伯特·马尔库塞(1989).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乐媛、杨伯溆(2009).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12：22－32.

乐媛、杨伯溆(2010). 网络极化现象研究. 青年研究，2:1－12.

利昂·P. 巴拉达特(2010). 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第10版).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李世涛主编(2000). 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全三册).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刘延勃、张弓长、马乾乐主编(1983). 哲学辞典.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罗伯特·杰维斯(2003).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诺贝尔托·博比奥(2012). 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威廉·F. 斯通(1987). 政治心理学.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西蒙(1988). 管理行为.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休谟(1996). 人性论. 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厚粲、徐建平(2003). 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钟镇藩.（1995）.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形态. 湖南社会科学，43－47.

Aldrich, John, & David, Rohde. (1997). Balance of Power: Republican Party Leadership and the Committee System in the 194th House.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In Jenkins, S. (2006). The Impact of Party and Ideology on Roll－Call Voting in State Legislature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1(2):237.

Berry, W. D., Ringquist, E. J., Fording, R. C. & Hanson, R. L. (1998). Measuring Citizen and Government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States, 1960—93.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1):327－327.

Berry, W. D., Fording, R. C., Ringquist, E. J., Hanson, R. L. & Klarner, C. (2012). A New Measure of State Government Ideology, and Evidence that Both the New Measure and an Old Measure are Valid. *State Politics & Policy Quarterly*, 13(2):164－182.

Blais, A., Blake, D. & Dion, S. (1993). Do Darties Make a Difference? Parties and the Size of Government in Liberal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40－62.

Bullock, J. G. (2011). Elite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 in an Informed Elector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3):496－515.

Campbell, A., Converse, P. E., Miller, W. E. & Stokes, D. E.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NY: Wiley.

Carter, T. J., Ferguson, M. J. & Hassin, R. R. (2011). A Single Exposure to the American Flag Shifts Support toward Republicanism Up to 8 Month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8): 1011－1018.

Cohen, G. L. (2003). Party Over Policy: The Dominating Impact of Group Influence on Political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5):808.

Daniel, W. P. (1971). *Political Ideology: It's Source, Meaning, and Functions*. Tuscaloosa: Bureau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Alabama.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Disch, L. (2011). Toward a Mobilization Conception of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1):100－114.

Feldman, S. & Johnston, C. (2014).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Ideology: Im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Complex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35(3):337－358.

Geertz, C. (1964). Ideology as a Cultural System.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5:55.

Gordon, S. B. & Segura, G. M. (1997).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the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of Individuals: Capability or Choi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9(1):126－147.

Greenberg, J. & Jonas, E. (2003). Psychological Motive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the Left, the Right, and the Rigid: Comment on Jost et a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3):376－382.

Goren, P., Federico, C. M. & Kittilson, M. C. (2009). Source Cues, Partisan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Value Expr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4):805－820.

Jansen, G., Evans, G. & Graaf, N. D. D. (2013). Class Voting and Left – Right Party Posi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15 Western Democracies, 1960—2005.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2): 376 – 400.

Jenkins, S. (2006). The Impact of Party and Ideology on Roll – Call Voting in State Legislature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1(2):235 – 257.

Jost, J. T., Banaji, M. R. & Nosek, B. A. (2004). A Decade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Accumulated Evidence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Bolstering of the Status Quo. *Political Psychology*, 25(6:881 – 919.

Jost, J. (2006). Revisiting the End of Ideology Claims. An Emerging Psych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deology. *Psicoloťa Polťtica*, 33:75 – 100.

Jost, J. T., Federico, C. M. & Napier, J. L. (2009). Political Ideology: Its Structure, Functions, and Elective Affinit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0:307 – 337.

Kahan, D. M. (2013). Ideology,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Cognitive Reflection.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8(4):407 – 424.

Klingeman, H. D. (1979).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Conceptualization. In Barnes, S. H., Kaase, M. et al.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Kunda, Z. (1990). 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8(3):480.

Latham, G. P. & Pinder, C. C. (2005). Work Motiv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6:485 – 516.

Lau, R. R. & Redlawsk, D. P. (2006). *How Voters Decid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per, T. J. & Slothuus, R. (2014). Political Parties,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Public Opinion Form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35(S1):129 – 156.

Lenz, G. S. (2013). *Follow the Leader?: How voters Respond to Politicians'* Policies and Perform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vitin, T. & Miller, W. (1979).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751 – 771.

McCoy, S. K. & Major, B. (2007). Priming Meritocracy and the Psycho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3(3):341 – 351.

Newell, A., Shaw, J. C. & Simon, H. A. (1958). Elements of a Theory of Human Problem Solv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65(3):151.

Roseman, I. (1993). The Psychology of Strongly Held Beliefs: Theories of Ideological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Attachment. In Schank, R. C. & Langer, E. Eds. *Beliefs, Reaso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Psycho – logic in Honor of Bob Abels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Scarbrough, E. M. (1984). *Political Ideology and Vot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imon, H. A. & Newell, A. (1971). Human Problem Solving: The State of the Theory in 1970.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2):145.

Tyler, T. R. (2006).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gitimacy and Legitimation. *Annual Review ofPsychology*., 57:375 – 400.